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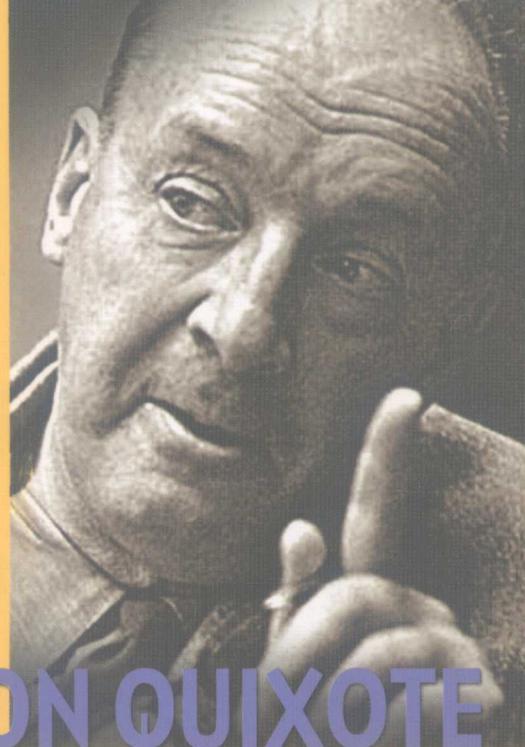
# LECTURES ON DON QUIXOTE

# 《堂吉诃德》讲稿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 金绍禹 译

《洛丽塔》作者

Vladimir Nabokov



上海三联书店



# 《堂吉诃德》讲稿

[美]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 金绍禹 译

LECTURES ON DON QUIXOTE

Vladimir Nabokov

 上海三联书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堂吉诃德》讲稿/(美)纳博科夫著;金绍禹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7. 4

(三联艺文馆)

ISBN 978 - 7 - 5426 - 2518 - 2

I. 堂... II. ①纳... ②金... III. 长篇小说—文学研究—西班牙—中世纪 IV. I55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7893 号

## 《堂吉诃德》讲稿

---

著 者 /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译 者 / 金绍禹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范峤青

监 制 / 林信忠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印刷七厂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300 千字

印 张 / 16.5

---

ISBN 978 - 7 - 5426 - 2518 - 2 / I · 320

定价: 32.00 元

##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1899—1977)

俄罗斯出生的美国小说家、诗人、文学批评家、翻译家、文体家，1973年因其终身成就被美国授予国家文学金奖。他曾执教于威尔斯利、斯坦福、康奈尔和哈佛等名校，讲授文学。他是全球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著作颇丰，其中最著名的包括《洛丽塔》、《微火》、《阿达》和《说吧，记忆》。



# LECTURES ON DON QUIXO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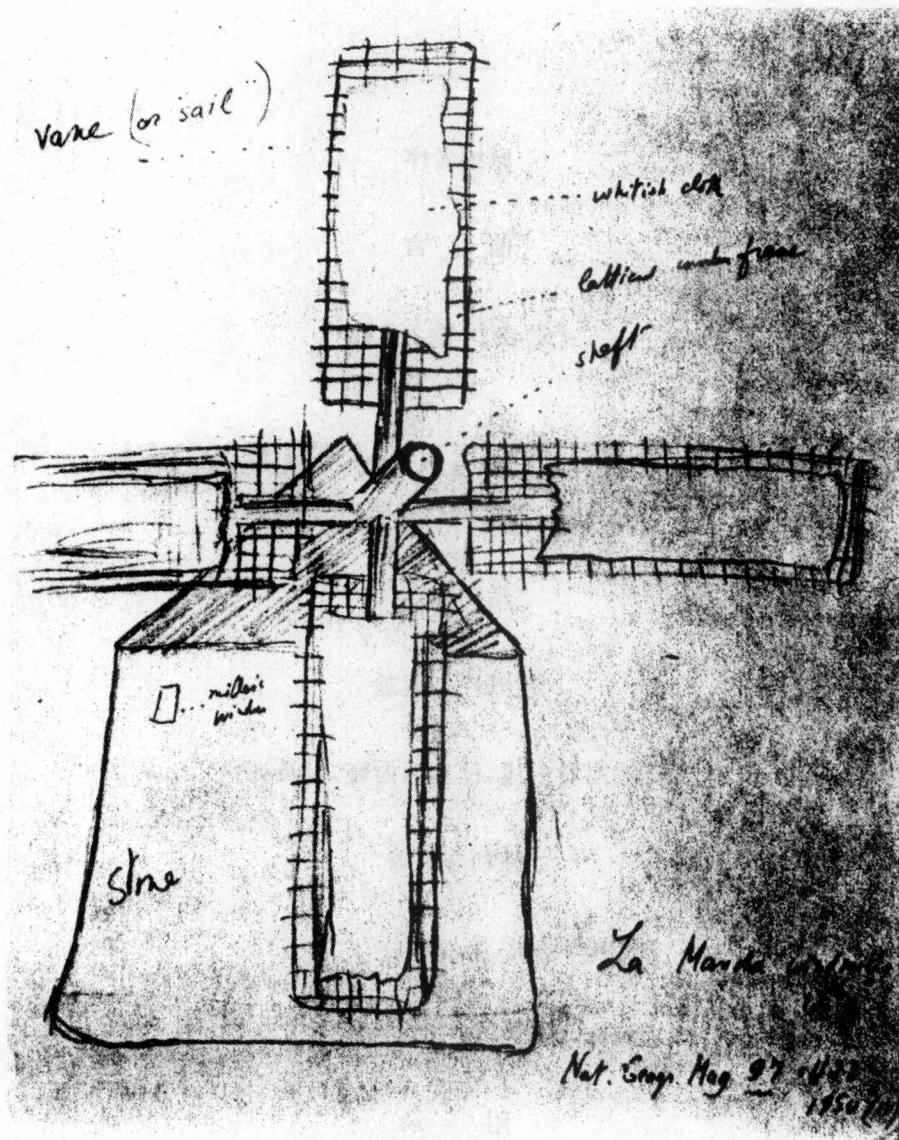
Vladimir Nabokov

三联艺文馆纳博科夫讲稿系列

《文学讲稿》

《俄罗斯文学讲稿》

《〈堂吉诃德〉讲稿》



纳博科夫画的十七世纪风车

## 原编者序

〔美〕弗莱德森·鲍尔斯

一九四〇年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来到美国，要在这个国家开始他的新生活的时候，根据他自己的说法<sup>①</sup>，随身带来了为他要面对的教学生涯做准备的不少讲稿。但是，关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的本系列讲稿却是专门花时间编写的，因为当时他向学校请假已经获得批准，从康奈尔大学正常教学任务中脱出身来，以便能够接受在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学年的春季学期到哈佛大学作访问讲学的邀请。

大约五年前开始实施的哈佛普通教育课程中，有人文学科一和人文学科二，第一学期教授史诗，由古典文学研究家小约翰·H. 芬莱担任，第二学期教授小说，由哈理·列文教授担任。两位教授对制订普通教育计划都非常有影响，而且教育计划中的人文学科一、二已经成为样板课程。而列文教授间或还须承担其他系科的工作，这样一来人文学科二就要由别人来代劳了。I. A. 理查德·桑顿·怀尔德，以及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三人根据各人情况的许可就来替列文教授讲课。根据列文教授的回忆，他在与纳博科夫谈及要讲授的作品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堂吉诃德》是讨论小说发展的合乎逻辑的起点。纳博科夫当时非常同意这一观点，以至于他立即着手编写专门为这一课程准备的一系列塞万提斯讲稿，并打算在这一课程结束之后再接着讲授他已经准备好的关于狄更斯、果戈理、福楼拜和托尔斯泰的康奈尔大学讲稿。但是并没有保存下来的证据可以表明后来纳博科夫回到康奈尔大学也讲授过塞万提斯<sup>②</sup>。

在哈佛担任的课程以及新的塞万提斯讲稿，纳博科夫都是格外用心地准备的。似乎他的第一个行动应该是将整部作品各章的详细梗概

①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坚决的意见》（纽约，麦克格罗—希尔一九七三版，第五页）。——原编者注

② 纳博科夫在康奈尔大学文学课中在不同时间分别讲授过简·奥斯丁、狄更斯、斯蒂文森、乔伊斯、福楼拜、普鲁斯特、卡夫卡、托尔斯泰、果戈理、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高尔基。关于这些讲稿，可参阅《文学讲稿》（纽约和伦敦：一九八〇版）和《俄罗斯文学讲稿》（纽约和伦敦：一九八一版）。——原编者注

写下来。由于他的教学方法是要大量引用所讨论的作者的原文,因此,这个梗概就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他自己的叙述,一部分是抄录的或加注的引文,两个部分都插入了他自己对于情节、对话、人物以及主题的许多评论。他采用的版本是撒弥尔·普特南的《堂吉诃德》英译本,一九四九年北欧海盗出版社出版,后来兰登书屋在现代书库丛书中重印。手稿里的参照页码几乎都是根据这个版本编写的(这个版本切不可与北欧海盗便携版节选本混淆,这是纳博科夫特别关照他的学生的)。不过,他指出,英国企鹅书局一九五〇年出版的 J. M. 科恩的英译《堂吉诃德》平装本倒还差强人意。

纳博科夫用来编写笔记和讲稿的那一册普特南译本没有保存下来,但是他的企鹅版平装本由纳博科夫家人保存着。这册书的许多段落旁的空白处都有铅笔画的线,但是让人感到失望的是,书上只有一两个字的批注,如第一卷第九章的疑问“胜利? 失败?”又如第二卷第三十章“公爵主线开始”。这一资料并不能明确地表示这册书是否真是纳博科夫的教学用书(他在讲稿里按照普特南版本页码标出的引文或许有误);不过幸运的是由于这册书上全然没有评注,因此这件事本身也就无关紧要,对编者也毫无用处。

故事与解说部分本书编排时放在六个正式讲稿之后,它是纳博科夫原来给小说写的梗概,当时抄录下来并打字,其格式则是方便必要时查考。在纳博科夫采用编写故事与解说的手法彻底地熟悉了小说之后,他开始第一次尝试讲稿本身的积极准备。因此,这部手稿的存在表明他最初是构思过一个叙述方法,即是在胜利与失败这一主线的基础上来分析《堂吉诃德》的结构。这部手稿提供的依据进一步证实,关于这样一个讲稿的系列他曾经写下一个相当详细的初稿。

他在准备这一研究的时候,从原先已经打好字的故事与解说中抽出许多页内容,并且把事件先后次序作了相当大的改动以便与新的中心主线相一致。详述、扩充、更加具体的评论这些手写稿,与重新编排的打字稿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已经定下来的胜利与失败主线的讨论。只是到了后来,在这一稿完成之后,本书六个讲稿所包含的更加多样的主线题目才在他的想象中形成,这一结构上的考虑,既优于他原先按时间先后次序研究的笔记,也优于作为叙述出发点的单纯互相对立的胜利与失败。

而这六篇讲稿的定稿,即当时在课堂上用的、现在放在六个讲稿夹

子里的讲稿，纳博科夫又曾经改写，加入了——因为他需要这些材料——从胜利与失败草稿中抽出的许多内容，以及又从故事与解说笔记原稿中抽出的材料，扩充了他的新讲稿。他删除了已经打好字但是不准备用的材料，然后把这些材料并入他的最后的手稿。第六章，论胜利与失败，后来根据新格式推倒重写。大约只有四十几页，即原故事与解说笔记的五分之一，单独放在一个夹子里，既没有用到草稿里，也没有用到最后的讲稿中。为了按照本书的需要重新编排原有的故事与解说的笔记，已经打好字的材料（可以根据页码来辨认）又从已经丢弃的胜利与失败草稿手稿中找回，手稿中的手抄部分因内容切合而加进讲稿，或插进故事与解说中。六篇讲稿的手稿中还部分地利用了另外一些内容以便重新使用那些已经打好字的材料，这些材料是纳博科夫在最后的手稿中插入他所需要的东西之后舍弃的。这个故事与解说的散落的内容于是就这样收集起来，与弃置的四十页左右未曾用过的原稿放在一起，便成了现在的故事与解说部分，整个内容仅少数几页残缺。

这一部分原稿的重新编排造成了评论与六篇讲稿前已引用的内容有一定程度的重复：这样的材料现在都已删去，因此，在故事与解说部分凡是涉及同样内容的地方，都是属于讲稿中的话题的扩充或者融合性质的。编者对材料作必要的编辑的时候，插进了许多的过渡段落，连接那些对纳博科夫来说仅仅是提示可能要加以详细阐述的引文；此外，许多引文都因其本身所具有的趣味而加以扩充，而且还新增了几条引文，以飨读者。为了弥补残缺的几页内容，编者插入了有限数量的故事梗概，以保持文章的连续性。

保存的手稿包括纳博科夫当初的六个讲稿夹子，每一个夹子装一个讲稿，其中偶尔还夹有几张散页笔记，应该认为是起初积累的背景材料。（这些笔记大多已经尽量用到讲稿正文里去了。）这一系列讲稿各篇幅有明显的差异，这一情况的存在，其部分原因是他在正文中画上警示的括号任意决定内容的取舍（因为纳博科夫对于宣读讲稿的时间安排是一丝不苟的）。此外，由于每一篇讲稿在课堂上所需时间的长短是相同的，因此讲稿张数的多少之所以变化很大，部分原因是他可能只是有限地使用（也许一页中只用几句话）最后定稿中要采用的最初编写的一些材料。除了从讲稿“胜利与失败”形式的初稿中抽出的打字稿散页之外，最后定稿的讲稿都是纳博科夫的手迹。当然，许多这些初稿的散页都是他在最初系统地研究这部小说时写下的原始摘要的打字稿。

第一篇讲稿大约有二十页；第二篇三十页；第三篇篇幅增大到七十一页；第四篇缩短到二十九页；第五篇增加到三十一页；第六篇最后一稿，包括结束语，大约五十页。除了主要代表实际讲课的这些讲稿，整个研究资料还包括大约一百七十五页弃置的梗概、散页，以及一个讲稿夹子，内有十五页关于阿维兰尼达<sup>①</sup>的伪作《堂吉诃德第二卷》的非常粗略的笔记。

编辑中所遇到的问题随后发生转化，我们试图要极大程度地展示纳博科夫对于《堂吉诃德》的了解，连同他的评论，规模则要比他所局限的六个课堂讲稿强行规定的范围大得多。那些的确不需要的材料纳博科夫会在讲稿上面彻底删除，一点都无法辨认删除的是什么内容。但是他也有根据时间的许可与否，将课堂上可能会读或可能不会读的材料放在括号里的习惯，用去的时间分钟数常常会在空白处旁注里标明。此外，他在使用他最初编写的故事与解说中的内容的时候，他可能会在因时间限制而不能采用，或者因为与当时他要讨论的问题缺乏联系而不能采用的材料上划一条斜杠。遇到这种情况，编者一概将这些标上括号的内容复原，因为这是原先抄录的材料的组成部分，通常都是相关的内容，而且假如课堂时间允许完全可能在课堂上讲解的。另外一些从散页打字稿中删去的材料也根据上下文插入，尤其是假如援引《堂吉诃德》会有所帮助；不过大多数这些弃置的材料已经放回到故事与解说部分，因为那是这些材料最初的来源。

纳博科夫通常都会把他要宣读的引文抄录下来，不过偶尔他也只是记下普特南译本的页码。倘若遇到后一种情形，人们也没有把握说，假如时间许可，他会不会打开书本读给学生听，或者会不会仅仅告诉学生书中的章节段落以便课后翻阅。（所有这些引文本书一一抄录）编者在处理这些引文的时候要求比较宽松，因为如若妥当，会把纳博科夫简短扼要的援引段落扩充，否则或是在正文中增添帖切的引文，或是在脚注里进一步阐述纳博科夫在讲稿中的论述。一般说来，除了详细的扩充内容之外，尤其是有括号内完全是他自己书写的文字为依据的扩充内容，讲稿遵循纳博科夫最后定稿的结构与次序。然而，第一章虽然采

---

<sup>①</sup> 一六〇五年《堂吉诃德》第一卷出版以后，一个自称阿朗索·费尔南德斯·德·阿维兰尼达(Alonso Fernandez de Avellaneda)的作家发表了《堂吉诃德续篇》，从而激发塞万提斯创作了这部著作自己的第二卷。——译注

用现在这样的形式,绝不能说是拼凑的材料,但是与其他章节比较起来,结构上显得松散,它不但是根据原先的材料组合起来的,而且还包括了分散在各讲稿夹子里但又与讲稿夹中的内容不相协调的单页材料。

由于最后定稿的讲稿是以各个不同的主线为中心的,从而并没有以一种固定的时间先后次序来论述故事的情节,因此,故事与解说所起的作用便可以是按照塞万提斯小说的章节提出关于小说的连贯一致的看法,中间插入讲稿正文中所没有的纳博科夫的说明和分析。因此,这一部分必须被看作是本书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这不仅仅是为了要了解纳博科夫对于《堂吉诃德》作为一部艺术作品的整体看法,而且也是为了一个更为平常的目的,即提醒隔世的读者想起在纳博科夫的讲稿中只是点到为止的这些故事情节。人们不妨希望本书的故事梗概不会影响初看本讲稿的读者,因受本书的激励,继而作为世界伟大文学的新经验去阅读这部小说本身。

最后,书后简短附录《亚瑟王之死》和《高拉之阿玛迪斯》节选是纳博科夫用来准备油印然后分发给学生的打字稿,他的意图是要让学生熟悉一下主人公堂吉诃德阅读并竭力模仿的骑士小说的典型段落。

## 前　　言

〔美〕盖伊·达文波尔特

“我很高兴地记得，”一九六六年纳博科夫对远道来蒙特勒采访他的赫伯特·高德说，“在纪念大厅当着六百个学生的面彻底批判了《堂吉诃德》，一部残酷而粗糙的老书，弄得我几个比较保守的同事非常震惊、非常难堪。”尽管他把这部书说得一无是处，而且是出于很充分的批评理由，但是他又把书重新作了研究。塞万提斯的杰作并没有列入纳博科夫在康奈尔大学的教学大纲，他显然不喜欢这部书，他在哈佛大学准备这部书的讲稿的时候（哈佛坚持认为他不可以不讲这部书），他的第一个发现是美国的教授们多年来把这部残酷而粗糙的老书美化成一个关于外表与现实的时尚高雅、随心所欲的神话。因此，首先他必须替处于长期以来对于这部书的误解所散布的一本正经的骗局之中的学生寻找一个版本。纳博科夫的新的解读是现代批评上的一件大事。

纳博科夫要将哈佛一九五一——一九五二的讲稿和康奈尔大学自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九年的讲稿加以润色的想法始终没能实现，我们这些不在一九五一——一九五二春季学年哈佛人文学科二“六百名年轻的陌生人”之列的人，必须读一读纳博科夫论塞万提斯，它是由美国最杰出的书目编制学家弗莱德·鲍尔斯根据现仍保存在马尼拉纸讲稿夹之中的笔记，一丝不苟地编辑成书，令人称道。

纳博科夫是在纪念堂宣读他的讲稿的，此地是最严谨的冷嘲家所能希望的极具象征性的处所。它是一个华而不实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建筑群，照马克·吐温的康涅狄格北方佬的肯定口气来说，的的确确是他梦里所看到的中世纪建筑七拼八凑的大杂烩。这一建筑是一八七八年为了纪念内战中被堂吉诃德式的南方邦联拥护者杀害的士兵，作为大学哥特式建筑实验性样板，由威廉·罗伯特·威尔和亨利·范·伯伦特<sup>①</sup>共同设

<sup>①</sup> 威廉·罗伯特·威尔(William Robert Ware,一八三二——一九一五)和亨利·范·伯伦特(Henry Van Brunt一八三二——一九〇三)，美国建筑师，均毕业于哈佛大学，建筑思想受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一八一九——一九〇〇)的影响。——译注

计的。在这座因瓦尔特·司各特爵士<sup>①</sup>和约翰·罗斯金<sup>②</sup>的想象的感召而设计的建筑上，在这一绝顶不切实际的建筑风格里，滑稽可笑的布局和细微的差别之鉴赏家，居然在来自拉曼查的天真无邪的老先生的问题上将我们推醒，若说事物对照之恰当，莫过于此。

我在肯塔基大学讲授《堂吉诃德》时，曾经有一位学生举起他那施洗礼者似的长臂说，他终于得出结论，这部书的主人公疯了。我说，这是个讨论了四百年的话题，现在是我们这些秋天的午后舒舒服服地坐在教室里的人说说我们的见解的时候了。“哦，”他没好声气地嘟哝道，“真叫人难以相信，他们会用厚厚的一本书去写一个疯子。”他说的他们是正确的。纳博科夫在哈佛大学如此巧妙地批驳的书是一本从塞万提斯的文本演变而来的，因此倘若有人拿出《堂吉诃德》来加以讨论，紧接着的问题就是，谁的吉诃德？是米什莱<sup>③</sup>的？是米盖尔·德·乌纳穆诺<sup>④</sup>的？还是约瑟夫·伍德·克鲁奇<sup>⑤</sup>的？因为塞万提斯的人物就像哈姆莱特、福尔摩斯和鲁宾逊一样，几乎是一经作家创作，就开始离开书本到处漫游了。

不仅堂吉诃德和他的朋友被持续不断地赋予浪漫主义的色彩，他和他的亲密朋友丘·潘沙——和蔼、糊涂而可爱的堂吉诃德！滑稽好笑的桑丘，如此栩栩如生地呈现在眼前的一个头脑冷静的农民！——而且小说的文字还被取而代之了，这样做的有插图画家，尤其是居斯塔夫·多雷<sup>⑥</sup>，奥诺雷·杜米埃<sup>⑦</sup>（以及现代的毕加索和达里<sup>⑧</sup>），还有小说的颂扬者、模仿者、戏剧改编者、堂吉诃德式这个词语的使用者，至于这

<sup>①</sup> 瓦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一七七一——一八三二)，英国苏格兰诗人、历史小说家、浪漫主义运动先驱者。——译注

<sup>②</sup> 约翰·罗斯金，英国艺术评论家，推崇哥特风格建筑和中世纪艺术。——译注

<sup>③</sup> 米什莱(Jules Michelet,一七九八——一八七四)，法国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法国史》、《法国革命史》。——译注

<sup>④</sup> 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一八六四——一九三六)西班牙哲学家、作家，他认为堂吉诃德是西班牙天才的化身。——译注

<sup>⑤</sup> 约瑟夫·伍德·克鲁奇(Joseph Wood Krutch,一八九三——一九七〇)美国作家、批评家。——译注

<sup>⑥</sup> 居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e,一八三三——一八八三)法国插图画家，笔法细腻，富有想象。——译注

<sup>⑦</sup> 奥诺雷·杜米埃(Honore Daumier,一八〇八——一八七九)法国画家，擅长讽刺漫画。——译注

<sup>⑧</sup> 达里(Salvador Dali,一九〇四——一九八九)，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译注

个词语,你要让它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什么意思。而它应该是产生幻觉,着了迷,或者与现实相抵触之类的意思。这个词语又如何有了绝妙的理想主义的意思,那就是纳博科夫在这些讲稿中要作解释的。

为了要把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放回塞万提斯的文本中,还其本来面目,纳博科夫(在研究了一批美国批评家及其对于该书的荒唐可笑、极不负责任的解说之后,觉得有必要这样做,从而鼓起勇气)首先一章接一章地写下了每一章的梗概——鲍尔斯教授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把这些梗概也编入了讲稿里。这一梗概体现的一丝不苟与孜孜不倦难免会让那些老师感到汗颜,因为他们没有读过这本书却仍然在尝试讲授一周的全国大学二年级概论课规定的《堂吉诃德》,说他们没有读过这本书,因为他们自己也仿佛只是大学二年级学生,至于这本书的第二卷,他们从来没有读过,或者(我就知道有一人)根本就没有碰过这本书。因为,《堂吉诃德》,正如纳博科夫不无痛苦和恼怒地了解的,并非人们所想的那种书。过多穿插期间的中篇小说(是我们在读《匹克威克外传》的时候因快乐而忘记的那一类)妨碍了无情节的故事情节。我们都在头脑里改写这本书,把它改写成了由一连串流浪汉和无赖的冒险故事组成的书:把理发师的铜洗脸盆拿来当作马姆伯里诺的头盔,挥剑战风车<sup>①</sup>(它成了这部书的典型的精华),向羊群冲锋,以及诸如此类的情节。许多对本书内容一无所知的人,也能够向你交出一个貌似真实的故事梗概。

纳博科夫在准备这个讲稿的时候他的眼睛不停看到的是准确意识到的事实,即这部书博得了残酷的笑。塞万提斯的因读书入迷而精神错乱的老人和他的浑身发臭的扈从,他们被创作出来是要让他们成为人们揶揄嘲弄的对象的。读者与批评家早早地就绕开了这个西班牙风格的嘲弄,把这个故事解读为另一种讽刺:这个讽刺指出,在一个粗俗并不浪漫的世界里,一个根本上是神智正常、富有人情味的灵魂不可避免地会变得精神失常。

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西班牙从传统上来说是拒绝接纳外来者的,它没有才能(例如像中国或者美国)接纳安置外来者。在塞万提斯生活的年代,就发生过歇斯底里发作似的疯狂驱逐犹太人、摩尔人以及具有犹太血统和伊斯兰血统的宗教皈依者的事件。在罗马帝国其他地

---

<sup>①</sup> 头盔与风车分别见《堂吉诃德》第一部第二十一章和第八章。——译注

区早就废除竞技场内屠杀角斗士之后,西班牙却仍旧保留着竞技场的屠杀(让老百姓娱乐)。举国上下的娱乐活动,即斗牛,即使在今天也使得西班牙在文明的人们当中让人另眼相看,无法接受。在《堂吉诃德》创作的历史时刻,即自称是最高天主教国王的多疑的偏执狂腓力二世统治时期,是我们撒上骑士故事银白月光的时刻。纳博科夫是在西班牙浪漫主义化的温床上讲课。洛威尔<sup>①</sup>和朗费罗<sup>②</sup>创造了一个西班牙,它牢牢地捉住了美国人的想象(有音乐剧《来自拉曼查》为证),而让人觉得可怜的是,美国的旅游者竟然会蜂拥前往西班牙去寻找那个西班牙。

然而,倘若从那个时代某个特定的角度来看,腓力二世时代的西班牙也具有堂吉诃德的特点。那个时代的贵族拥有的盔甲,哪个骑兵都不敢穿着去参加战斗。腓力二世本质上是一个老是抱怨个不停、无事自扰的国王,他常常将他的空盔甲竖立在那里,让它检阅部队。而他自己却待在宫内,身处四周都是给人以感官享受的提香<sup>③</sup>绘画的环境中,不停地算账,阅读和评注每一封发向遍布国外的使馆和密探网络的信件,以及从这个网络收到的每一封信件。这个网络的跨度之大可以从新世界到维也纳,它的深度可以从鹿特丹到直布罗陀。倘若要给他找一个模特儿,他就是堂吉诃德,但是他是一个非正统的吉诃德。跟堂吉诃德一样,他也生活在梦幻之中,而这个编织的梦幻又不停地撕破。他焚烧异教徒,可是你怎么知道一个异教徒是异教徒呢?难道他不也是像堂吉诃德一样身处认识论的麻烦层出不穷的关节,看到的羊不仅仅是羊,而且还是摩尔人吗?腓力二世的密探老是在抓人,怀疑他们是(假如你知道怎样去查出来就好了)口是心非的皈依者,是人道主义者、新教徒、犹太人、穆斯林、无神论者、女巫或者上帝知道还有什么罪名,但是那些被抓的人对那些折磨他们的人说,他们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当时的欧洲正经历一个现实开始发生大逆转的时期。哈姆莱特

<sup>①</sup> 洛威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一八五六——一九四三)美国教育家,曾任哈佛大学校长。——译注

<sup>②</sup> 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一八〇七——一八八二),美国诗人,曾任哈佛大学近代语言教授(一八三六——一八五四)。——译注

<sup>③</sup> 提香(Titian,一四〇九?——一五七六),意大利文艺复兴繁荣时期画家,擅长人物肖像画。——译注

用云朵形状的不稳定性这一手法来戏弄波洛涅斯<sup>①</sup>。堂吉诃德玩弄自己的天赋才能是时代的忧虑的焦点。身份，在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事关见解，或事关坚定信仰的问题。乔叟<sup>②</sup>之笑话“猪骨头”并非对人们所尊敬的真正的圣徒遗骸抱着怀疑态度。然而在《堂吉诃德》书中把饮马的水槽与洗礼盆混为一谈却非常严肃地提出了一个问题（无论塞万提斯有没有这个意图），我们称之为洗礼盆的东西，在我们不具备我们赋予它以产生幻觉的魔法的情况下，是否真的就是水槽。

多少年以来，我觉得，《堂吉诃德》所包含的意义已经改道转入启蒙运动的潮流中，堂而皇之地冒用了我们非常情愿地奉上的假名。这就是为什么纳博科夫会如此严密观察的问题之所在。他想要让这部书独立地成为它自身，一个童话故事，成为独立于“现实生活”这个神话之外的一部想象的创作。然而，《堂吉诃德》恰恰就是一部与“现实生活”有着不解之缘的书。从这部书的特定角度来看，它就是一篇阐述意义如何进入事物，如何进入生活的论文。这是一部论述着魔的书，论述在这不再着魔的世界里着魔的不合时宜的书，论述泛泛而论的着魔之愚蠢的书。尽管如此，它令人着魔。由于许多的误解，又由于我们的参与配合，它成了它所嘲弄之物。

纳博科夫是美国人心理的敏锐观察者，他知道坐在下面听他讲课的六百名哈佛大学的男生女生都相信骑士，正如他们都相信牛仔漂泊漫游的古老的西部，相信纪念堂的哥特风格的建筑一样。他没有花费时间要叫他们的头脑清醒起来；实际上他倒是高高兴兴地告诉他们，他们从他这里不会听到关于塞万提斯的介绍，不会听到关于塞万提斯的时代或他的失去的左手（在勒潘托失去的）的情况。相反，他倒是要求他们一定要知道风车是怎么样的，而且在黑板上画了一架风车，并向他们讲解风车的部件。他向他们解说为什么一个乡绅会把风车当作是巨人——风车在十七世纪的西班牙，这个在整个欧洲最不愿意听人说新事物的国家，纯然是一件新鲜事。

关于村姑杜尔西内娅，他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也觉得非常有趣。但

<sup>①</sup> 见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第二幕第二场。——译注

<sup>②</sup> 乔叟(Geoffrey Chaucer, 约一三一三——一四〇〇)，英国著名诗人，主要作品有《坎特伯雷故事集》。——译注

是他没有离开正题去大谈特谈骑士的典雅爱情，它的离奇的变型史及其今天的奇怪的残存形态，从而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倘若在他宣讲这些精心编写的具有修正观点的讲稿的时候，他的一部分心思确实在走路只需几分钟就可到的哈佛大学博物馆，即他花去了过去十年中的八年，作为昆虫学研究员研究蝴蝶的解剖学的地方，那么，他的另一部分心思必定是在论证典雅爱情的课题上，即探讨三年之后成为《洛丽塔》的典雅爱情的疯狂与愚蠢。一个西班牙语的名字的昵称，多洛雷斯，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洛丽塔》极其顺理成章地是纳博科夫色彩的主题(对立面作为自身，错觉的繁殖力，理智与沉迷的相互影响)的一个序列，因此，它不可能因纳博科夫认真仔细、单调乏味地阅读《堂吉诃德》而接受其影响。然而作为两部作品，“互相协调的直觉”的流浪汉与无赖的冒险历程确实是存在的。而且还有小精灵洛丽塔的存在。在西方当浪漫的爱情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她起初就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孩子，不管她是男孩还是女孩，不管她是萨福<sup>①</sup>的可爱人儿，还是阿纳克里恩<sup>②</sup>的小伙。柏拉图从哲学的角度解说这样的没有出息的爱情，让它成为他称之为对于理想之美的热爱的东西。这个主题在古罗马人沉重的手中变得淫乱、盛气凌人，到了中世纪初期几乎逐渐消失，而最后到了公元十世纪又以骑士浪漫故事的形式重新出现。到了塞万提斯的时代，典雅的爱情已经充斥文学(其实，现在的情况依然如此)，于是，他在讽刺典雅爱情及其新条件——骑士精神——的同时，觉得显而易见，要把德与美的常见的优秀典范，赋予一个长得一双大脚，还有一个凸起的肉赘的乡村少女。

《堂吉诃德》绝没有对浪漫的骑士故事的富有活力产生过任何影响；它只不过是创造了一个强有力的、并行的传统，并且从此以后便与浪漫的骑士故事平行地发展。理查逊<sup>③</sup>的传统现在也会和菲尔丁<sup>④</sup>的传统平行发展。我们会保留理想的美，然而在隔壁屋子里还住着包法

<sup>①</sup> 萨福(Sappho, 公元前六二〇？——公元前五六五？)，古希腊女诗人。——译注

<sup>②</sup> 阿纳克里恩(Anacreon, 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抒情诗人，以写爱情诗著称。——译注

<sup>③</sup> 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 一六八九——一七六一)，英国小说家。他的书信体小说《帕美勒》被称为英国第一部小说，对西欧文学影响深远。——译注

<sup>④</sup> 菲尔丁(Henry Fielding, 一七〇七——一七五四)，英国小说家，剧作家，批评家，为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奠基人之一，代表作有《弃儿汤姆·琼斯》。——译注